

## “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 及其对策北京座谈会”纪要

1994年7月底在北戴河召开“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之后,“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又于1994年8月30日在京组织召开了同一主题的座谈会。座谈会为时一天,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就中国生育率下降本身及下降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新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现将本次座谈会发言的要点整理如下:

研究组总负责人乔晓春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主持了本次座谈会。他指出,本次座谈会是7月份北戴河会议的继续,目的有三:一是通报北戴河会议情况;二是听取政府有关部门对本项研究的意见;三是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乔晓春就座谈会的内容谈了框架性的意见,一是如何认识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因为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所面临的新人口问题显然与我国生育率下降有关,那么中国生育率到底是如何下降的?已经下降到什么水平了?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特点有哪些?凡此种种,都应有基本的判断;二是伴随生育率下降所出现的人口老化以及老年人口问题;三是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包括性别比偏高问题及原因以及性别比偏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四是伴随生育率下降,家庭结构核心化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独生子女问题、家庭结构变化问题以及代际关系问题;五是在社会上有所争论的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这方面在政府部门虽有所定论,但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六是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对此是有争论的,譬如,劳动力短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么是在全国范围内存在还是局限在某些地区?最后是关于生育健康问题的讨论。

李宏规副主任(国家计生委)从两方面谈了个人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研究组所讨论的“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这个题目很重要,研究完全必要。另一方面,他谈了自己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的认识。他提出,从1992年或1993年开始,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已开始进入持续下降的阶段。从粗出生率

的统计看,1991年为19.68‰,1992年为18.24‰,1993年为18.09‰;从总和生育率看,对外宣传是2.00,而38万人的抽样调查是1.7,联合国的统计则为1.8,总之,在更替水平以下。李宏规指出,在国别比较研究中要注意中国与日本、西欧不同,在下降原因上差别很大。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不是自发实现的,从本质上讲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因素所致。李宏规认为,研究组在咨询报告中所列的问题较为全面,而中国生育率下降三特点中的“不彻底性”(另两个特点是不稳定性、不平衡性)是新的提法。从湖南蹲点情况看,现在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还是靠强有力的措施,依靠的是乡村两级的力量,人口数量控制方面的问题目前还不能忽视。

在谈到人口负增长问题时,李宏规认为山东泰安的情形要引起关注。泰安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可能在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时在各地有普遍性。但泰安的负增长并不正常,到晚婚不让结婚,有资格生二孩的男性只有在30岁后才准许等做法表明基层工作基本上还是靠强制措施,没有计划生育,低生育率肯定要反弹,所以不能视为成绩。最后,他还提出了若干在今后值得研究的问题:市场经济与人口控制问题;城乡计划生育综合治理问题;城市拆迁户、下岗职工的计划生育问题;三资企业职工的计划生育问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问题;计生队伍稳定问题;扶贫、计划生育相结合问题,等等。

谈到新人口问题,哪些是生育率带来的?而哪些不是?相关和共生的现象未必有因果联系。查瑞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认为,要分清主、客观原因,也要区别不可避免的与可避免的问题。有些是主观做法不合适带来的,因而是可避免的,如出生性别比问题,查教授举了一个形象的“下台阶”的比喻——一步一个台阶地下还是一步三个台阶?太快了就可能跌跟斗,欲速则不达。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只在如何正确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查教授还认为,生育率低

不是挑战,高生育率才是挑战。控制人口增长在目前还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为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仍然需要使生育率下降;对某些地区人口的低负增长进行考虑和讨论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担忧,重要的是如何使全国的生育水平达到更替水平。现在,理论上应该肯定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强制”有时也是必要的,这里的“强制”可理解为计划生育是在引导人们按某一规范走,虽然严一点,但规范本身没有错。

谈到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查教授明确指出:首先是老年人口问题,然后才是人口老化问题。只要有老年人,就有老年人口问题,因此老年人口增加这个问题的产生和计划生育没有关系。老年人口增加不是生育率下降的后果,而是人口过多和过去高生育率的后果。从家庭结构变化看独生子女问题,可以说独生子女问题与生育率下降是有关的,但其它意义上的独生子女问题是属于教育的问题,并非计划生育直接带来。而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是同计划生育有关系的。此外,查教授还就尚有争议的“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乔晓春在补充发言中强调:我们主要研究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泛泛的问题,另外,人口老化并不带来老年人口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加剧老年人口问题。

顾宝昌博士(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认为,将科学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让社会去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但现在我们做得很不够。人口学的“内部繁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要理论推向社会,我们自己就必须保持理论上的一贯性,要有理论上的说服力。譬如,生育的波动和反弹现象究竟是何种关系,理论上迄今还缺乏圆满的解释。如果不能保持理论上的一贯性,事情就不好办,工作就会出现偏差。目前我们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的问题,譬如,农民的生育愿望与我们的计划生育是有差距的,尤其是转变中的愿望,什么叫转变好了?什么叫思想“改造”好了?“改造”到生一个就“改造”好了?有这种生育愿望吗?我们的期望值应该设在一个恰当的地方,这能否给予讨论?再譬如,现在有两种生育率下降,一是从高向低降,二是低生育水平之下的下降。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少生一个可以给家庭带来各种好处,但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却缺乏有力的理论来说服人。随着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的到来,西方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这

时人们少生孩子就是为社会作出牺牲的问题了,与此同时,对计划生育工作就提出了尽快向服务型转换的问题。毫无疑问,只有我们自己把概念弄清,才能够对社会作正确的引导。譬如,有人认为,人口问题是生育问题,生育问题也就是多生少生的数量问题,而其实人口问题的面要广是多。最后,顾博士也谈到一点遗憾,就是研究中对妇女问题注意不够,希望今后能加强。

杨子慧社长(《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也发表了很多意见。他认为,目前人口研究中有些问题在升温,如,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人口负增长问题,家庭小型化问题,妇女地位问题。研究组的这项研究对人口学的发展是具有推动作用的。首先,中国生育率下降不是内因性的而是外因性的,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不是全局的而是局部的。过早宣传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并不适宜。其次,现在将人口老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相混淆的情形较严重。研究组将人口老化,老年人口问题列入生育率下降问题的研究不太确切,老年人口问题决非生育率下降所造成,而是过去的高生育率所致。再次,人口老龄化指数达到相当程度后才可能带来问题。现在研究的是前瞻性问题。现在胶东半岛人口老化程度超过7%,有人就提出是否还搞计划生育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过去高生育和低经济水平共同造成的。再次,家庭小型化问题并不完全是生育率下降的结果,现象上似是而实际上却非。家庭小型化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家庭观念发生转变分不开的,主干家庭解体直接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至于“四二一”问题,反映的不是家庭结构,而是抚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结合。理论上讲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最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是否是有条件的,单从生育率角度看并不科学,也有生产力条件。在胶东半岛,本地的就业问题基本解决,反而出现劳力不足现象,于是大量从外省区招工。这样,一方面局部地区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在宏观上劳动力剩余严重。这是可以通过余缺调剂来解决的。

另外,在对策研究中要对现行政策予以特别的关注。现在有两种倾向:一是人口老化了要调整生育政策;二是人口负增长出现后也要求调整政策。杨子慧认为,现行政策不能更改,因为政策波动对生育率有直接影响,这会导致对计生工作的破坏性影响。目前,东西方文化交流已达到了新的层次,与此同时,人们的婚育观念、婚育行为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将对生育

率产生影响,注意到这一点是有必要的。

人口统计专家陈胜利副司长(国家计生委规统司)对当前人口形势和生育率下降情况作了介绍。就TFR来讲,80年代有过两次高峰,1980年TFR为2.24,达到70年代以来最低点,1982年2.82,1984年2.10,1989年2.59,此后就持续下降,1988年2.31,1989年2.25,1990年2.15,1991年2.0,1992年1.84,1993年1.82。这说明从80年代以来,生育率确实有所下降,这个下降提出了许多问题。那么是否真的降到了这么低的水平呢?从1992年38万人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1991年TFR为1.8,1992年为1.7。另一个问题是,数据是否带有“水份”?数据经过反复修正还是很低。所以,陈胜利认为数据基本反映事实。

他认为,要用“终身生育率”来衡量生育水平,要长远地看。从终身生育水平看,中国并没有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目前的低生育率是暂时的。今后生育水平肯定要回升,或波动或反弹到2.2左右的水平上,因此对“低生育率”不能盲目乐观。在西方,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从过程看,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基本一致,两者同时下降。但中国不同,这就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同时终身生育率并没有降下来,而且总和生育率也不是一味地下降,而是在不太稳定的态势下下降,还有波动。总之,在东西方比较时,不能简单化,目前中国的TFR到底处在什么水平上,在1995年小普查以后会一目了然。

谈到人口老化,陈胜利认为在现阶段主要还是非农业人口的老化问题。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终身生育水平差别较大。不能满足于在宏观上说中国人口老化严重,研究要更细致些。谈到人口负增长,也是同样情形,不仅上海,全国许多大城市均出现了负增长,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口老化的影响程度并不一定亚于生育率下降。

党小清副司长(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对研究所确定的研究方向及已经取得的成绩也给予了高度赞

扬。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计划生育目前必须解决两个认识问题,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控制人口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工作思路问题,人口控制到底为了什么?二是怎样为人口控制进行综合治理的问题。他认为在计划生育的四化中(即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科学化最重要。

林富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将研讨主题理解为生育率急剧转变后的人口问题,而非一般转变的结果。他还认为,目前达到的低生育率是计划生育所产生的强控效应,以后会逐步回升,但不会大幅度回升;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主要是独生子女父母的教育问题;“四二一”不是抚养关系,而是微观的家庭数量的关系。

胡瑛(国家统计局人口司)认为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不大。生育率下降将持续一段时间。

邬沧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发言中指出,在过去的研究中曾有过一些误解,如,认为研究低生育率与人口控制矛盾,或者认为低生育率表明人口控制大功告成。低生育与人口控制并不矛盾,其中有很大很深的学问。发达国家到低生育基本也就达到零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含中国)不同。发展中国家从低生育到人口零增长大致要30—40年,中国也差不多。计划生育是否随低生育率实现而应该终止?不应该。妇女地位、权益、安全的人工流产、生育健康等都很重要。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只研究生命统计指标的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只研究到“三低阶段”,亦即现代静止人口而已。许多问题没有研究,如人口老化,特别是老年人口的老化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几百万年里老年人口只占3%,只是最近几十年内才上升到5%、10%的水平上。老龄社会的老年人口问题是全新的,但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问题决不仅限于一个人口老化的问题。

(“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